

容闳与幼童留美

李志茗

中国首次四批留美幼童的派遣，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滥觞，开创了清季教育史的新纪元，诚如曾国藩、李鸿章所说的，“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它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樊篱，标志着传统教育的坚冰解冻，不仅因此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写下重要篇章。

派遣留学，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也是洋务教育思潮发展的必然。“学齐语者，须行而置之庄岳之间”，遣派留学生当然是向西方学习的最直捷途径之一。洋务人物虽然早有此议，却因提不出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而没有下文。于是，激荡的时代将此任务赋予一个热心于留学教育并为之奔走不息的爱国学者——容闳。

一、教育理想 好事多磨

容闳自幼受西式教育，异常推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以此反观当时中国的现实，更加感到中国之腐败黑暗，不禁感到快快不乐，萌发了借异域文明改革和复兴祖国的愿望。“予既远涉重洋，自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俸遂予求学之志……则当日夕图维，以冀平生所学，得以见诸实用”。1854年，容闳将要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深感中国的落后在于文明之不昌，便开始产生“教育救国”的理想，“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臻于文明富强之境”。这也即是其留学教育思想的嚆矢。既存此念，他毅然乘船归国，图实现其宏愿。

但是，理想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他往来于香港、上海之间，屡迁其业，无用武之地。面对腐朽的政府和陌生的环境，报国无门，五年虚度。无奈之下，他把目光投向他曾“几欲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希冀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或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①

1860年11月，容闳借机访察太平天国，并至南

京晤见旧友洪仁玕，条陈七事，其中，尤突出教育，提议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以及制订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等建议。与同时代的郭嵩焘、冯桂芬设外语学校和洪仁玕建学堂、废科举等改造和更新教育的主张相比，容闳的建议更具体，更完整，体现了他对民众教育、军事教育及实业教育的推重和关注，也显示了其“教育救国”主张的实质性内容。可是，通过对太平军的几天实际考察，容闳断言太平天国革命不过是“一姓之废兴”，“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乃“顿悟其全不足恃”，根本无法指望它来实施自己的方案。失望之余，便扫兴而去。

1863年，因幕僚的引荐，曾国藩召见了。这一召见，就成为他生平事业的转折点，他开始替曾效力，并渐得其赏识。1866年，容闳提出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践”，得到曾的嘉许，乃得实行。他非常兴奋，得意地说：“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了。于是，他信心大增，开始构思其酝酿已久的派遣留学计划。

1868年，值老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之际，容闳前往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得到赞同。便草拟条陈四则，请其转奏当政。容闳后来说：“此条陈之一、三、四，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这第二条，即其留学教育计划：“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步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②真可谓筹思周密，高瞻远虑。有此雄心壮志，容闳满怀憧憬：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在这里，容氏公开提出以

派遣留学为核心的“教育救国”主张，确实独树一帜，超出同时代洋务诸人的认知水平。

可好事多磨，容闳的条陈因故被束之高阁。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丁日昌、容闳均北上协助曾国藩处理善后。事毕，容氏乘机进言于丁，请其向曾重提三年前教育计划一事。时恰值洋务活动亟需外交和科技人才，容的计划立即得到曾的首肯，并由他和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旋奉殊批准可。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忘其为偃卧床第间”。其兴奋心情溢于言表，他认为自己夙愿的实现，“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③

二、派遣留学 开创先河

容闳提出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一经批定之后，曾国藩就召他共同商定：（1）派遣学生额数；（2）设立预备学校；（3）筹定经费；（4）酌定出洋年限具体事宜。他们还决定在美国成立驻洋肄业局，由陈兰彬担任正委员，容闳担任副委员，共同承负派遣学生与赴美经理监督之责。

诸事商妥之后，当即着手拟定章程，筹备招生。章程规定：人数“暂定为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之写读，其曾入学校已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当未出洋之先，学生之父兄须签名于志愿书，书中明自愿听其子弟出洋留学十五年（自抵美入学之日起，至学成止），十五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皆不负责。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均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

招生章程规定，容闳等便开始招生。同时，在上海山东路设立一所预备学校，由刘瀚清（曾是曾国藩的幕僚）任校长，吴子石任副校长，并各聘请中英文教习各三名，拟对所招收的幼童进行汉语、英语的培训，以准备放洋赴美。按照《挑选幼童赴美肄业章程》的规定，招生工作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地进行。可由于当时国内风气未开，人们视外国为凶地，目出洋为畏途，加以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终不愿子弟离乡背井，远赴茫茫异邦，因此在这些地方连三十名幼童都招不满。容闳只得亲赴香港，于英国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其优秀者北上入学，

凑满足额。

经过一年的培训后，187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在委员陈兰彬的率领下，自上海出航，前往美国。其后，1873年，1874年，1875年第二、三、四批各三十人相继成行。^④至此，遴选幼童赴美计划初步完成了。容氏梦寐以求、苦心构思的教育计划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这四批幼童，最初被安置在美国居民家里，分散居住，以便熟练英文单词，学习日常会话，从而适应陌生的语言环境。到能听懂用英语讲课之后，幼童们就进当地的小学、中学学习，然后考入高等学校，接受专业化教育。

他们的学习任务比较繁重，除了同美国孩子一样每星期须在公立学校上课，接受系统的西学教育外，还得定期轮流去驻洋肄业局读经书，练汉字，作文章。《选派幼童出洋应办事宜》有规定：留学生在学西学的同时，仍须“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而且他们还不断受到训导“洋文汉文，更要融会贯通，方为有用”。这样，幼童们只好受此亦中亦西之双重教育，被迫在攻读西学的同时，还要努力学好汉文。否则便会遭到被遣送回国的厄运。

可即便如此，他们“人人能善用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颇佳”。^⑤李圭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也有所记载，可资佐证：“尝见共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序》、《美国地土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李也不由得对幼童们口中称善，“心甚爱之”。事实上，留美幼童亦正是凭他们的优异成绩，颇为美国教育当局器重，“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应当说，他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在美国人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

三、中途夭折 原因复杂

虽然，留美学生聪颖肯学、成绩喜人，前途“正未可量”，但是，囿于当时中国的专制社会制度及偏激的文化价值观念，注定避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1881年夏，清政府悍然下令对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登时，“郎当一百人，一一悉遭归，竟如瓜蔓抄，牵累何累累！”^⑥就这样，随着绝大部分留美学生的凄然回国，容氏苦心经营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便告夭

折，其致力多年的西学东渐事业也付诸流水，毁于一旦。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留学生“越轨之举”的结果。出国前后，清政府反复告诫他们：“但要思出洋本意，是令尔等学外国功夫，不是令尔等忘本国规矩，是以功夫要紧学习，规矩不可变更”。所谓“规矩”就是留学生必须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封建典籍，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一齐遥向清皇叩头，以示尊君亲上，此外还要“保存辫发，守祀孔之礼”。简言之，即应在牢记圣道，遵守传统礼仪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有用之材”。然而，幼童们毕竟求知欲极强，同时亦颇具可塑性。当他们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封建国家，被移植到一个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终日饱吸自由之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他们敢于跨越传统圣训的雷池，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蹴踘驰骋，不复安行矩步”，还进舞场，入耶稣教，穿西装，剪发辫，拒行三拜九叩礼等等，思想行为、价值观念逐渐“越轨”而美国化，开始步入异质文明的发展轨道，这样，不免招来守道人士的气愤和责骂，他们遂兴风作浪，致使留学生的中途撤回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二)正副委员的矛盾所致。清政府虽然接受容氏派遣幼童留美的建议，但因顾虑他“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的毛病，对他极不放心，深怕他大权在握，把幼童们引上西化“歧路”，遂始终只给他一个“副委员”头衔，并另外委派正委员加以监视、掣肘。

清政府先后派出四个正委员，其中三个是正统科举进士登第。^⑦应该说，作为一批较早走出国门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也算是开明者，但毕竟自幼深受封建教育，思想传统保守，惟俯首听命是从。因此，他们深谙并秉承清政府的旨意，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出发，只准备把留学生们培养成思想守旧，能为洋务活动效力的科技、外交人才。而容氏则把留学教育视作自己“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倡导幼童留美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教育以培养出掌握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从而振兴中国，实现近代化。显然，新旧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异趣，造成二者在培养学生培养目标上的矛盾，由此导致正副委员经常发生龃龉，双方关系很紧张。陈兰彬对容氏心中“不无快怏”，三番五次向李鸿章要求请调；容增祥斥责容氏“意见偏

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⑧容氏自己推荐的吴嘉善则更肆意攻击他不尽职，“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凡此种种，众口铄金，愈益加深了清政府对容的猜疑，以致听不进容在留学生裁撤问题上的辩解，反而对他横加指责，为留学生的中途辍学命运加重了悲剧色彩。

(三)主事者的推波助澜作用。陈兰彬等四名正委员同洋务诸人一样，很讲究中体西用，即使他们面对西方的异质先进文明，仍固执己见，视长袍马褂为中国的正统服饰，四书五经为根本的必学课程，蓄留长辫为尽忠朝廷的标志。当他们发现留学生们的穿着举止完全背道而驰时，不禁捶胸顿足，痛心疾首他们的离经忘本。陈兰彬上奏说，留学生“外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⑨区溥良也向刘坤一“条陈局中利弊”，在背后进行诋谤；容增祥亦向李鸿章证实“学徒抛荒中学，系附实情”。这正是清政府所忌讳和担心的，不由得它又多了一分撤回留学生的决心。而吴嘉善刚开始也附和和陈兰彬等人的意见，并多次找到陈兰彬，不无担忧地指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治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因此亟应将该局裁撤。^⑩后来在留学生撤回与否的僵持中，吴嘉善改变其初衷，认为留学生就学程度不一，应分几年裁撤。已入大学或将入大学者，即将成才，可暂由使馆管理，待毕业后返华；其他的留学生及总办、教习、翻译等，皆可裁撤。李鸿章认为这是审时度势之言，可资采取。但陈兰彬却对吴嘉善的变计颇为恼火，并把吴早先向他面谈的全数撤回意见奏复朝廷。经过讨论，李鸿章仍有半撤半留之意，而奕訢则“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⑪这样，留学生们的中途撤回，大势已定。

(四)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当清廷内部对留学生的裁撤问题仍犹豫未决，争论不休时，美国早已有之的排华运动突然变本加厉起来了。加州、卡罗拉多等地掀起的排华恶浪，美国政府不仅不予干涉，还制订了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于是，有一御史“遂乘机上一封奏，请即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报复美人之恶感”。吴嘉善马上给以配合，宣称要“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华，余事弗管”。奕訢则干脆以各局用人之际为由，上奏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得到了批准。

1881年夏,九十四名留学生“分作三批回华,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机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逐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虽然绝大部分留学生是中途辍学,且分配的工作又专业不对口,但经过一番努力和艰苦奋斗,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政界、军界的重要人物,或工厂、企业、铁路、矿山等经济建设部门的骨干力量,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诚如温秉忠所说的,“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①显然有点夸大其辞,但综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界、教育界、他们的成就有目共睹,无法否认。

追根溯源,留学生的出国学习及日后的巨大贡献,虽非容闳一人之功,但其创办、倡导和催生作用,颇值称颂。正如舒新城所评论的,“无容闳,虽不能说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样子,故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闳”。^②容闳以一农家幼童留美留学,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目睹和感受了西方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富强,而日益认识到当时中国的闭塞落后和积贫积弱,乃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开始

致力于西学东渐,改革和振兴中国的努力。基于对留学教育的情有独钟,他殚心竭虑,奔走不息,“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③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始作俑者,并开创了近百年来中国人留学欧美的先河。但是他的先知先觉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其所作所为亦因曲高和寡,孤掌难鸣而告败,可他毕竟在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方面作出了开拓性努力,成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驱者,他理应为后来者所赞誉和敬仰。

注释:

①②③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63, P86—87、P91, P108

④ 当时第二、四批同行的还分别有7名、3名自费留美幼童。

⑥ 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陈学询、田正平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⑦ 四个正委员分别是陈兰彬、区潯良、容增祥、吴嘉善。除容增祥外,其余三人皆为进士登第而吴嘉善是唯一的“翰林”出身。

⑧ 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2, P7。

⑨⑩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二)P166。

⑪ 《传记文学》37卷3期,高宗鲁编《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⑫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留学史》P2,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⑬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

(上接50页)

上重点符号,以引起重视和思索,引导解题的思路。试卷中标有黑点符号的计有11处。

(3)对部分试题的答案可有一定的弹性,考生答对标准答案的部分内容即可得满分。如65题要求列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特点,标准答案规定两个主要特点必答外,其余两个特点学生可有选择的余地。第61、62、68和69题亦然如此。

(4)调整部分试题的形式以降低难度。例如同考生我国开始有确切纪年至今约有多少年?由填空题改为选择题就降低了难度,但同样达到了考查的要求。又如第4题是一道选择识图题,图上标出了齐、秦、燕、楚的都城,启发了学生的解题的思路,也就降低了难度。

(5)示范解题思路和方法以提高整体答题水平。69题中有几个材料对比的小题,试卷中有一示例,使考生了解答题的要求,同时降低了不必要的

难度。

(五)

今年的历史试题在加强中学教学导向和有利于高校选拔新生方面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与改进。实际效果,有待于实践和总结,不少理论和实际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高考的试题与会考的要求距离较大,教与学如何适应这一要求?高考与会考如何做到既有联系和衔接、又有区别和提高?高考试题要体现高校专业学习能力选拔的要求,其深浅程度如何掌握?怎样的度才切合中学生掌握历史能力的实际?史料题是近年来推出的一种新题型,其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今年上海试卷中史料题的比重已近25%,这个比重应掌握在什么水平上才恰当适度?以上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地探索与解决,我们衷心希望得到专家和同行们的批评与赐教。

(执笔:朱正谊)